

少城文史資料

第五輯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少城文史资料

第五辑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成都

少城文史资料（第五辑）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成都市王家塘街49号 610031）

内部准印证 成都字第1316号

成都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厂址：成都市文家巷

开本32 印张5.5 字数100千

工本费： 2.00元

目 录

战斗在在祠堂街的《新华日报》成都分馆·····	康本善(1)
盛名夙著的树德中学·····	张志英(13)
少城公园散记——成都市民众教育馆纪实·····	邓穆卿(24)
文化公园述略·····	马景全 曾成志(30)
从振兴川剧忆新又新大舞台的时装川戏·····	戴文鼎(36)
第一骨科医院的兴起和发展·····	张慎沅(42)
成都穆斯林清真寺·····	张世明(49)
少城逸闻集锦(二)·····	吴绍伯(54)
成都市西城区四十年社会发展见闻录(二)·····	孙光彬(59)
巴蜀奇葩——蜀绣·····	高德华(67)
成都冷锻手工业·····	李维先(75)
墨海春秋	
——历经坎坷，激流勇进的成都墨水厂·····	宋披天(86)
科学实验设备厂的崛起·····	曾成志 朱之彦(96)
解放前成都棉织业工会概况·····	邓春圃等(104)
便饭馆“努力餐”·····	周少稷 白景纯(113)
川味正宗，荣乐园饮誉海外·····	龚 浔(116)
成都名菜、名小吃琐记(续)·····	熊志敏等(125)
成都典当业今昔·····	戴文鼎(133)
成都交通今昔观·····	吴剑洲 胡重威(138)
建国前的四川电信概况·····	王大炜(148)
“将军衙门”忆旧·····	刘显之 庞孝益(153)
前成都市长李铁夫事迹忆述·····	米庆云 熊志敏(159)

战斗在祠堂街的 《新华日报》成都分馆

康本善

一、成立经过

《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最初名“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它是以邹风平为书记的中共四川省工委于1938年2月决定建立的。1937年国共合作形成以后，党中央于同年11月底，即派邹风平、廖志高等同志回四川，着手重建与恢复党组织，并统一领导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于12月24日抵达成都以后，即在马道街建立了省工委机关。工委在清理党组织的同时，决定成立“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由罗世文同志领导，具体工作由曹福源（又名曹鏞、曹澍、曹孟泉）同志负责。其任务是：（一）推销报纸，扩大党的影响；（二）为失掉党的关系的同志提供找党的方便。

1938年2月下旬的一天，曹孟泉同志根据地下党刘光旭同志转给他的约会条子，在东御街“和平旅馆”楼上会到了廖志高同志，接受了在祠堂街103号（后改为88号）开一门市铺子以便推销《新华日报》。3月3日，曹孟泉同志带着廖志高同志的介绍条子在祠堂街103号与罗世文同志接上头。罗世文同志说：“你来了就好，今后的任务就是推销《新华日报》和《群众》、《解放周刊》，还可兼卖一些进步书籍。”“你最好搬进来住，尽快开门营业，要争取时间。”于是，曹孟泉同志立即书写了一张“新华日报成都代购处”

的直幅，贴在103号铺房右边的砖墙上，4日开始营业，三天内订了四份报纸。代订处开始起家了。到20号左右，订户发展到30多户。3月下旬，订户又在不断增加。曹孟泉同志等向罗世文同志作了汇报，按照廖志高同志原来给曹孟泉同志说的名称，把“代订处”改为了“新华日报推销处”。4月中旬，推销处建立了党支部，杨绍轩（又名杨继干）同志担任支部书记。5至8月，组织上陆续调来申同和、王锦章、洪希宗、宋万禄等同志。支部改选，洪希宗同志被选为支部书记。

1939年4月，正式成立“新华日报分馆”（又名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洪希宗同志担任经理，发行数已发展到近万份，推销站遍布彭县、邛崃、乐山、新津、雅安、西昌、汉源等十多个县。

二、共产党在成都的联络点和宣传窗口

《新华日报》成都分馆除负责办理订报、发送报纸外，还经营出售各种延安书刊，如《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编的《群众周刊》等，也出售“战时出版社”、“生活书店”等发行的进步刊物。

《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还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在成都的一个半公开的联络点，也是八路军的运输车从重庆到西安的一个必经的转运点。川康特委组织的一些党的骨干和爱国青年去延安学习，有的就是通过分馆联系，改装成八路军后勤人员，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车子去延安的。如1940年初，朱德总司令留养在成都某同志处的一个女儿，就是由分馆派人到沙河铺接到分馆，改装成八路军的小护士，乘八路军办事处的救护车去延安的。

由于《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的工作人员及时把宣传共产党

主张的《新华日报》送到读者手中，因而《新华日报》在读者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新华日报成都分馆也因此成了共产党在成都的联络点和宣传窗口。1945年冬，国民党特务为破坏反对内战的运动，造谣诬陷，逮捕了四川大学进步学生李育实。《新华日报》为此连续登了5篇消息、通讯。分馆迅速地将刊载这些报道的报纸送到读者手中，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应，使报纸的威信更加提高。“一位经常偷看阅读《新华日报》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不时来分馆找杜桴生商谈，流露他对蒋介石蓄意扩大内战，破坏和平，坚持独裁，压制民主等行径的无比愤慨。经过多次商谈，由杜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他终于弃暗投明，驾机起义，投奔了延安，以实际行动加入了反对内战的行列。这位正直的爱国军人就是刘善本同志。”

三、反对敌人破坏坚持斗争

《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自成立后，很受读者和进步人士的欢迎，但国民党反动派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把她视为眼中钉。他们每天不仅派几十名特务跟踪，而且动员了所有特务机关加以监视和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新华日报》发行和阻挠《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包括以前的推销处和以后的川西北总分销处成都营业分处）工作的手段有以下几种：一是派外勤特务偷报架、撕贴报；二是勾结警察从报贩手中抢夺《新华日报》；三是收买报童，造谣攻击；四是收集读者名单，监视订户；五是派遣特务打入内部；六是借事生非，趁机捣乱。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要求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保障《新华日报》的发行，经过斗争，取得了胜利。1939年8月，四川省政府

以廿八年秘编字00747号训令成都市政府：“案准内政部渝警字〇〇一九六六号咨开：‘案据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社长潘梓年呈，为各地党政军警教育机关妨害合法发行，或禁止人民售卖，或阻止学生购阅，请予保障等情，查该报与该刊曾经本部核准登记，据呈前情，除以凡经中央核准登记其内容如不违背或曲解抗战建国最高准则和三民主义及本党政纲政策，自在法律保障范围之内等词批复外，相应咨请查照飭属知照为荷。’到府除分合行令外，令仰知照并飭所属一体知照为要。此令”。成都市政府根据四川省政府的训令立即于同年9月18日以社字0819号训令各区署执行。

虽然如此，但国民党反动当局并未停止对《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工作的捣乱和破坏。

1940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制造了一个所谓“抢米事件”，对分馆进行了一次大破坏。事件是这样的：在1940年3月14日一大早，国民党特务机关根据事先的策划，派遣了二、三百暴徒，在老南门外集合，然后涌到潘文华的重庆银行外南黄门街办事处，用大石块将银行的大悲巷仓库砸开，闯进去把囤集的大米弄出，煽动群众去拾取。这伙歹徒还摧毁了营业室、雇员宿舍，故意高喊“无产阶级万岁”等口号。新南门外，《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地下党员），本来是附近赶来观看的，特务即将准备好的“共产党文件”塞进他的口袋，硬说他是共产党派来的抢米现场指挥者，强行捕走。很快，蒋介石成都行辕即以“抢米暴乱指挥者”的罪名，在通惠门外墙边枪杀了朱亚凡。3月16日晚，反动派勒令电厂故意停电，祠堂街一片漆黑。特务乘朦胧之中埋伏在分馆附近。八、九点钟，分馆领导人罗世文同志来门市部，刚进门口，便被尾随的特务架走。11时左右，一伙

特务第二次涌进门市，逮捕了经理洪希宗同志。洪希宗同志被架走不久，就传来了特务在“努力餐”的砸门声，车耀先同志在当晚也被捕了。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悍然下令查封了成都分馆。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特派《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同志，赶来成都进行营救与恢复分馆营业工作。经过斗争，国民党当局答应分馆启封营业，但坚决不放人。罗世文、车耀先很快被转移到重庆，后被杀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洪希宗则被害于成都龙泉驿半山腰。川康特区在“抢米事件”发生之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采取了转移、疏散措施。此后，由《联合书店》经理万国钧向潘健萍转达总馆经理熊瑾玎同志的指示：为了不给敌人以任何借口，分馆割断与地下党的联系，无论赔赚与否，一定要坚持开门营业，继续高举《新华日报》这一标志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经过这次严重打击，报纸发行量陡然下降到只有一千五六百份。只运纸型来成都翻印也不得不停下来，改由总馆交邮局寄来成都。工作人员也相应减少了，只剩下申同和、李椿、潘健萍等人。虽然如此，分馆同志仍然顶着逆流搞好《新华日报》的发行。

1941年“皖南事变”两个月后，分馆又遭国民党军警和便衣特务的一次公开搜查。一个星期日下午，分馆负责人申同和同志收到一个邮卷，有二十多份铅印传单和“快邮代电”，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该军政治委员。内容还揭露了国民党妄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并向社会呼吁。申同和同志收到后，立刻在分馆店堂内一样贴了一张，因而吸引了广大读者来阅读抄写，弄得反动派异常恼怒。他们借口：“扰乱社会治安”，当即派遣军警撕掉电文，并捣毁了门市，搜

查了工作人员。经过这次事件，以及“皖南事变”发展的形势，组织上决定进一步疏散分馆人员，报纸的发行量只有二百来份。这时，有的读者要求他们订的报纸不要送，由他们自己不定期来取；也有的要求邮寄。邮寄时，分馆工作人员把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党军日报》等找来作包皮，包卷《新华日报》，然后分散到各邮政分局或街头邮筒投放，以避免邮检特务扣留报纸。其次是利用本市的职业报贩，给以优惠，让他们暗中去售。

1941年春，分馆与生活书店、三联书店联合举行了一次大减价，尽可能把大批革命刊物送到读者手中。反动派借口“出售反动书刊”，将分馆和两家进步书店查封。当时分馆只有潘健萍一人在场，他立即打电话向重庆总馆报告了分馆的困难处境。总馆负责同志指示说：“只留下你一人了，也要坚持发报工作，即使一张报纸发不出去也不要紧，重要的是分馆这个据点要坚守住。”事件发生后，重庆《新华日报》总馆立即向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呈文：“本报成都营业处为推销本报之营业机关，曾在当地政府备案准予设点，两年以来并未闻有超出业务范围的不法之事，乃竟被省会警察周于二月八日突将该处查封，在政治是破坏国内团结，在法律是侵犯人民营业之自由，此种破坏抗战压迫舆论之举动，内则动摇抗战人心，外则使友邦惋惜、敌寇快意，本报为抗战为团结，除对此种举动严予抗议并分呈外，理合备文呈请大部察核，即日函知四川省政府转飭省会警察局启封，并乞依法保护是为公便”。与此同时，《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又给四川省政府发了代电，要求立即启封。经过斗争，四川省政府于3月5日代电《新华日报》社长，寻找借口称：“经飭由省会警察局报称，系生活书店及新华日报书报部等出售反动

书刊，奉令查封，惟该部与新华日报社合处一狭小铺面，执行人员在查封之前，曾向该部经理详晰说明，只查封书报部，请将报社迁移，以免发生误会，但据答称，该社与书报部系混合一起营业，不便离开，乃飭将所有书刊自行辟地检置，听候处理，然后铺门右侧贴上封条，至于铺门左侧仍属该社照常营业出入门径，等语，合电知照”。在四川省政府代电给《新华日报》社长的同时，省会警察局的警察撕掉了封条，分馆恢复了营业。“原来这时分馆的经理申同和……赴重庆向总馆报告，由周副主席亲自出面同国民党中央政府强硬交涉，逼使他们启封的。”

1942年冬至1943年初，分处报纸发行量又慢慢回升，恢复了送报工作，增加了三个专职送报工友，报纸发行量已上升到三、四百份。为了扩大发行量，分处加强了报纸的征订宣传工作，在成都各大电影院幻灯广告宣传，同时在春熙路与商业场街之间竖立大广告宣传，征求订户。国民党反动派看到《新华日报》的发行量日益增大，感到恼火，就一方面派特务胁迫电影院停放《新华日报》的宣传幻灯广告，并于1943年2月22日夜派警察暗地把竖在商业场街口的《新华日报》宣传广告牌拿走；另一方面又派遣警察和便衣特务，撕毁贴报，殴打报童，抢走报纸，甚至暗中捕人，破坏《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为此，《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经理李椿同志和《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同志先后于2月27日、3月9日给成都市政府递交了呈文和函件。潘梓年给成都市政府的函件说：“查本报为早经政府立案之合法报纸，五年于兹，每日刊载之稿件，均经重庆新闻检查处审查合格。不意本报成都营业分处在省会所在地，竟被公开阻挠发行，初则劫毁广告，继而撕夺报纸与殴打报丁，嗣后暗中捕人，显系有人不

顾大局，蓄意破坏团结，实违反国民党十中全会所示，对各党各派，政府当一视同仁，不予歧视之决议。用特 缕 陈 前情，恳请陈飭所属，澈究真象，严加制止，查释 报丁 张 少明，并予缉凶归案法办，以维国法，而利抗战宣传。”成都市政府接到潘梓年的函件后，以社一字第0528号公函致四川省会警察局，称：“查此案系属贵局范围，相应转清查酌办理，并希将办理情形见覆为荷！”对此，四川省会警察局除函复重庆《新华日报》外，还向所属的东南西北分局发布训令。训令在略抄了潘梓年的函件以后命令道：“函复暨分令外，合行令仰速即查明具报为要。此令”。

特务机关为了破坏《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在公开打劫、暗捕报丁的同时，还以种种“罪名”逮捕分馆负责人。1943年9月4日下午，《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主任李椿乘自行车外出，在返处途中遭手持武器之便衣者三人绑架而去。事件发生后，《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立即向成都市警察局递交函件，请求警察局查明释放李椿。潘梓年的函件说：“本报成都营业所分处主任李椿，于本月四日下午乘自行车外出，于六时二十分左右返处时，途经君平街、陕西街口，突遭手持武器之便衣者三人前来，强欲将其架去，当经该处岗警干涉，将双方解送贵局所管南区文庙西街警察分局询问，至今未见归来，特函请贵局迅即飭属查明释放李椿外，并请将李椿被捕真象详予赐复。”以后，潘梓年又向四川省政府递交了呈文，要求四川省政府查明释放李椿，并保护成都营业分处人员的安全。对此，四川省政府张群于10月29日向四川省会警察局发布了训令：“令省会警察局，案据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呈称：‘查本报成都营业处主任李椿……。不久，即又有便衣队十余人将李椿自该警察分局迫赴委员长行

轅。本报获悉后，曾于9月8日各文呈请行轅查明释放李椿在案。顷奉行轅九月二十五日法平字第九八二二号代电略开：查本轅并无匪衣之组织受理此案，并无李椿其人等语。惟查李椿被捕经过，系当地市民所亲眼目睹，且经君平街、陕西街口之岗警干涉，并解南区文庙西街警察分局询问，足见李椿被一便衣队捕去之事实历历可查。窃在省会所在地一新闻机关之负责人，无故被一便衣队捕去，万目睽睽，警察可证，治安机关为保护人权，应予追究。本报以成都营业分处之业务不能一日或辍，故派发行课副主任顾造新到蓉暂为维持处务。综上各情，理合备文报案，除恳请保护本报成都营业分处人员安全工作外，并恳对该分处主任李椿无故被捕，准飭治安机关澈查真象立予释放，以障人权，实为德便，等情。据此，合行令仰遵照查明核办，具报核夺。此令。”但是，四川省会警察局并未释放李椿，而顾造新又因病亟待休养，为了搞好《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新华日报》总馆又派张均继任成都营业分处主任，并于1945年2月3日函请成都市政府保护张均的安全：“查本报成都营业分处主任李椿，自三十二年九月初被捕后，曾派发行课副主任顾造新到蓉维持。迄今一年有余，李椿仍无下落，而顾君又因病亟待休养。兹特派张均继任该分处主任，即日到蓉工作。用特函恳贵府飭属保护为荷。”经过斗争，四川省政府根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45年2月16日机字四一四二号公函，于同年3月2日向四川省会警察局发出了保护张均的训令：“如该员外（出）行动，即希予以保护。”

特务机关见公开打劫和破坏不行，又采取更为狠毒的一手——在《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内部安插内奸进行破坏。1946年6月，国民党川调室情报科长王醒予与宪兵特高组

长潘兴时合谋，绑架了营业分处送报组组长吴健（“工抗”成员，又名吴炎，参加宪兵特高组化名吴烈勋）和报馆工人朱云（赵鑫全），诱迫他们充当内线特情。吴健被特务机关收买后，就把一个埋藏得比较深的特务刘伟介绍进营业处工作。吴健利用窃取的送报组组长这个职位，破坏《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暗中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告密，迫害读者。他还在营业分处内部挑拨离间，制造混乱，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因此，当时的领导罗石生同志决心从内部消除这条毒蛇。营业分处首先抓好内部整顿工作，进行了整风学习，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形成严格的组织纪律，使他无隙可钻。对于特务分子吴健，分处既不简单地撕破画皮撵他滚蛋，也不打草惊蛇，而是进行深入地调查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不但发现他政治上的许多问题，而且发现他在经济上有贪污行为。准备就绪后，罗石生同志找吴健谈话。开始，他顽固抵赖不说，罗石生同志便拿出材料，把他的劣迹一个个摆出来，弄得他张口结舌，面色发白。在大量的罪证面前，罗石生代表分处领导和全体同志向他宣布：“你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再用了，请你马上离开分处。”吴健还要死狗赖着不走，又不能否认事实，就露出凶残的面目，恶狠狠地威胁说：“狗急了要跳墙，人急了要杀人。”罗石生严肃地回答说：“革命就不怕死，怕死就不革命。我既然来了就不怕牺牲，请你走。”吴健看到画皮已戳穿，威胁也不起作用，只好灰溜溜地滚出了分处。

尽管特务对《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不断进行迫害，但营业分处仍岿然不动，屹立在祠堂街88号，读者队伍仍然较大，人民也非常相信，这确实使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可终日。1945年冬，中统局派徐政到川调室来继孙云峰的主任

职务。徐到任后，下定决心要拔掉在国民党心脏地区的这颗钉子。

1946年春，全国反美反内战的民主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中统局发动了一次与此针锋相对的所谓“护权爱国运动”。这个运动以反苏反共为其内容。在发动前，先通过国民党中宣部指示其所属的“中央社”、《中央日报》、《中央周刊》等御用宣传机关，制造舆论，造谣说，共产党与苏联红军勾结，在东北杀死爱国工程师张华夫，企图使东北脱离祖国独立。青年党在成都的机关报《新中国日报》也帮助摇旗呐喊。谣言一出，川调室的学运组与三青团合作，在华西坝逼迫大中中学生参加，举行了一次所谓“护权爱国大会”。会后举行所谓的示威游行。他们沿途散发中统制造的宣传单，手拿川调室制造的三角旗，在街头上狂呼乱叫反苏反共口号。因为在陕西街的燕京大学没有人参加，在学生队伍中的中统特务大叫：走！到燕大去，问他们是不是中国人？队伍把燕大包围了一阵，燕大不理他们，特务又率领队伍到祠堂街，包围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特务头子徐政在电话上指挥，令将营业分处以“民众的义愤”为名捣毁，企图从中收集文件和订户名单。结果，什么也未捞着。但捣毁后的成都营业分处，第二天又堂堂正正地开门营业，群众十分敬重。自抗日战争结束后，《新华日报》高举：“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旗帜，发行量继续增加。这时，“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工作人员已由六七人增加到二十余人。

四、被迫停业，启事告别

1947年，正当分馆工作顺利开展时，国民党反动派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查封了重庆《新华日报》。3月1日

上午，营业分处正式接到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的通知，要营业分处即日停止营业。3月4日，营业分处起草了一份《忍痛告别启事》，一式三份，由唐晋同志分别送往《华西晚报》、《新民晚报》、《新新新闻》三家报社刊登。另外还用毛笔抄写一份核桃般大字的启事贴在营业处大门上：

“敝处自开业迄今历时七载，社会人士与广大读者，对于本报的爱护，无微不至，有加无已。这就表明本报的努力是合乎国人的需要，而且是深得国人信任的。本报工作同仁，无时不以此兴奋，以此鼓励。现在本报虽遭挫折，被迫停业撤退，今不得不忍痛告别爱护本报的读者和社会人士，但这七年中，读者与社会人士给予我们的爱护，我们永远是不会忘记的。我们为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今后当更坚定，更积极，以酬答国人对我们的期望与爱护。谁也看得出光明的前途，已一天迫近一天，本报与读者见面的日子，一定不会远。再见吧！最亲爱的读者！再见吧！爱护我们的一切朋友！”

这份启事，以真诚的感情，简明的语言，表达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工作人员的衷心谢意；表达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同时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发动内战，反共反人民，封闭《新华日报》的无耻罪行。

3月5日，“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的部份工作人员，在成都警备司令部派出的军警强迫下，坐上他们提供的汽车，忍痛向默默无言的送行群众依依惜别。从此，“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暂时在成都国统区停止了营业。

盛名夙著的成都树德中学

张志英

成都市树德中学校址在成都市青羊区的宁夏街树德里，现有初中12个班，高中18个班，学生690多名，教职员工170多名，占地33300平方米，是当前四川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之一。该校在解放前即颇具盛名，办学成绩在当时成都近三十所私立中学是最为优异，与公立中学中著名的成华联三所中学竞相媲美，同受社会舆论一致称誉。

前国民革命军29军副军长孙震（字德操）先生幼年家境清贫，深感寒门子弟力学之苦，因对于有志上进而无力就学的青少年早寄同情，当他事业有所成就之时，便本着先哲“树德对人”的古训，立志兴学。1930年前后分别于赖家店、多宝寺、宁夏街和簸箕街等处开办了四所树德第一至第四完全义务型的小学，学校不收学杂费，在校生还发给书本及制服一套，并免费供给伙食。食费节余，期末发给学生。家境特别困难的学生另可申请御寒衣物补给，经学校核实发给。继又考虑到学生小学毕业后还须继续深造，孙先生更捐巨资，购置宁夏街西来寺筹办树德中学。1932年秋，当小学第一班毕业时，树德初级中学已经筹备妥善，分男女生两部开始招生，男生部在宁夏街树德里，女生部在同街树德巷，相距不远，管理教学都极方便。初中开办时，对学生的待遇一如小学。1937年秋，初中第三班毕业时，学校增设高中，